

国家重点学科

国家“211工程”重点学科建设项目

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



张懋镕 主编



商周时期青铜豆整理与研究

张翀 著

线装书局

国家重点学科

国家“211工程”重点学科建设项目

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·青铜豆卷

商周时期青铜豆整理与研究

张翀 著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商周时期青铜豆整理与研究/ 张翀著. —北京:
线装书局, 2013. 4

(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/ 张懋镕主编. 第1辑)

ISBN 978-7-5120-0948-6

I. ①商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青铜器(考古)—研究
—中国—商周时代 IV. ①K876.4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82575号

商周时期青铜豆整理与研究

作 者: 张 翀

责任编辑: 曹胜利 程俊荣

装帧设计: 刘聪建

出版发行: 线装书局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(100009)

电 话: 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 址: www.xzhbc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制: 北京市通州天宝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8

字 数: 26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0001—1000

定 价: 795.00元(全3册)



彩版1 卫始豆



彩版2 狩猎纹豆



彩版3 四虎蟠龙纹豆



彩版4 重环纹铺



彩版5 邵方豆



彩版6 漆豆



彩版7 错金夔纹豆



彩版8 曾侯乙豆



张懋镕 1948年生,江苏苏州人。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,同年考取研究生,从我国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研习古文字。1985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,并留校任教。1997年晋升为教授。主要从事古文字、青铜器、商周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。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证书,享受国家特殊津贴。出版著作12部,发表论文140多篇。曾赴美国、日本、奥地利以及台湾、香港作学术访问和演讲。现为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。



张翀 1980年生,祖籍河南荥阳。200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,获历史学学士学位。同年考取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研究生,师从张懋镕教授,研究方向为青铜器。2006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,同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职,在先秦史研究室从事青铜器金文以及先秦史的科研工作。曾任张懋镕先生主编《青铜器论文索引》(2002~2006)编委,参与《西安文物精华·铜镜》一书的条目撰写,在《中国史研究动态》、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》等辑刊上发表论文数篇。

多卷本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》

编写缘起

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工作,多卷本的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》即将出版。回顾往事,真是百感交集。

30年前,我的处女作《释“东”及与“东”有关之字》发表,从那时候起,青铜器的学习与研究注定成为我一生的追求。

29年前,我开始师从李学勤先生研习古文字。中国古文字有很多分支,如甲骨文、金文、战国文字、简牍帛书文字。先生告诉我:“你在陕西,陕西有很多青铜器,你就做金文研究吧。”在先生的指导下,我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,这令我终生受益。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《周原出土西周有铭青铜器综合研究》。所谓综合研究,就是从青铜器、古文字、历史文献三方面来研究。从此综合研究成为我研究青铜器遵循的准则与方法。

1989年,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成立新的专业——博物馆专业,大概考虑到我本科学的是考古,于是把我从文献专业调到博物馆专业。除了继续讲古文字,又开了一门新课“青铜器鉴定”。自此之后,我开始系统研习青铜器,包括没有铭文的青铜器。

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,我渐渐对中国古代青铜器有了新的认识。

概而言之,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,自两宋以来,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,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尤其是近百年来的研究,在青铜器的分期、分区系、分国别、分器类诸方面卓有成效,为世人所瞩目。

回顾历史,也毋庸讳言,我认为就青铜器基础性工作而言,其资料的整理还远远不够。且提一个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问题:迄今为止究竟有多少件中国古代青铜容器(尚且没有涉及兵器、工具、车马器、钱币、铜镜等)?几万还是十几万,恐怕连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都没有,专家也说不清楚。家底不清,研究对象模糊,研究很难继续深入。由于中国古代青铜器资料十分庞杂,其收集、整理并非易事,所以这一部分的工作非常重要。说到研究,比如青铜器的定名,鼎、鬲、簋等各类器物的分类研究,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,各类纹饰的分类研究,纹饰和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,各个阶段铭文的特点,器物、纹饰、铭文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对断代的作用等等,其研究或不够系统,或不够深入,有些方面甚至是空白。

20多年来,我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,写了《西周方座簋研究》、《两周青铜鬲研究》、《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》、《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》、《青铜器自名现象的另类价值》等文章,希望从器类、断代、地域、定名等多个角度和层面对青铜器进行探索。

同时我也十分关注国内外青铜器研究专家的成果。他们的论著是我案头的必备书籍,我反复阅读,受益无穷。

在研究中,我深感个人力量的有限。从1999年招收青铜器方向研究生起,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构想:如果研究生本人没有更好的研究题目,我就请他(她)来做青铜器中的某一部分的整理与研究,或某一类青铜器,或某一类纹饰,或某一时段的铭文,等等。经过10多年的积累,已经完成了20多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。其中分器类的整理与研究完成多半,某一地区、某一时段的铜器的整理与研究正在进行,纹饰与铭文的分类、分时段研究也做了一部

分。这些为多卷本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》的编撰奠定了基础。同时，我注意到其他先生也在指导研究生作类似的学位论文，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与帮助。

前几年，在编写《青铜器论文索引》的过程中，与刘聪建先生多有接触。他听了我的上述介绍后，很感兴趣，遂与我商定，在原有研究生论文的基础上，由我主编，各专题作者分别著述，形成一套多卷本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》。计划在今后的若干年里，陆续完成和出版20卷以上的著作。

写作多卷本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》的目的拟在全面、系统整理青铜器资料，充分吸取古今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对青铜器的形制、纹饰、铭文、组合关系等方面作全方位考察和研究，并试图总结出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产生、发展、消亡的基本途径、规律、特点及其原因。这是一个遥远的目标，但我们有信心一步一步地走近它。

由于这套多卷本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》的作者都是毕业不久的研究生，眼界有限、文字青涩是在所难免的。我的指导也很有限，很多问题我也不懂或知之甚少。当时作学位论文时，我希望他们放大胆子去写，因此他们的观点与我也不尽一致。但无论如何，在阅读他们的学位论文时，在与他们的反复讨论、交流中，我也有很多收获，这是最令人快乐的事情。我将阅读后的感想写出来，作为序言放在书前，就是希望继续与大家讨论，将《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》延续下去。而随着一本本书稿的出版，这一批年轻的作者也逐渐走向成熟，这或许是比书稿的出版更有意义的事情。

最后要感谢参加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审阅论文的诸位先生，并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你们的批评与帮助。感谢陕西师范大学暨历史文化学院给予的大力支持，感谢刘聪建先生和他的员工，让我们十几年来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。

辛卯年夏张懋镕写于

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

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容器器形演变与 功能转化的互动关系（代序）

我们的这套多卷本《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》，以青铜容器器类研究为主，张翀的这部研究青铜豆的书籍，是其中的第一本，我对他有很多期望。青铜容器器类的研究，可追溯到上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对觥、盃的研究，而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研究青铜容器器类，则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，先后有爵、方鼎、盨等器类的专门研究。不过以研究生学位论文为基础而形成的专著，张翀的这本书应该是第一本。或许是因为几年内专注于一件事情，他在资料的收集和论述的深度方面，都有不凡的表现。读了他的书，我们会对青铜豆的产生及发展的过程、特点、原因有比较清晰的认识。特别是书中谈到青铜豆形制演变导致其功能的变化的说法，对我有很大的启发，于是想借写序言的机会，谈谈我的一点感想。

中国古代青铜容器的形状、大小决定了它的功能和用途。从肇始期夏代到衰落期汉代，中国古代青铜容器的形状、大小始终处在不断地演变中。随着青铜容器形态的演变，其功能和用途也在不断地变化着。或者正是由于青铜容器功能的变化，要求其形状、大小随之而变化。这说明青铜容器器

形演变与功能转化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。过去研究青铜器时对这一点关注较少,今举出众多例子,试作理论。^{【1】}

一、个案分析(1): 青铜豆

青铜豆从商代晚期开始出现,一直到战国甚至汉代还存在。对于包括青铜豆在内的青铜器类来说,在研究它们的发展演变过程时,通常采用历史时期的划分方法来切割,如商代晚期、西周早期、西周中期以至于战国晚期等等。诚然,这种划分方法可以使用,但仅仅如此尚不够,如果没有依据不同的青铜器类的自身发展演变的特点来划分阶段,则很难清晰地凸现其具有规律性的变化轨迹,也就很难高屋建瓴地去把握它。

我们认为青铜豆的发展演变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。这个阶段青铜豆的形态主要是一种无盖浅腹豆,因其腹部很浅,故称之为盘豆、浅盘豆。我们把这个阶段名之为无盖浅腹豆阶段。第二个阶段是从西周中期到春秋早期,这是一个过渡期。由于周人重食的原因,包括青铜豆在内的盛食器均有了很大发展,如簠的型式多样化,新的盛食器如簠、簠的出现。本来青铜豆应该有很大的变化,但是受到簠、簠的制约,其型式变化不大。看看此时出现的豆形簠,形态极似春秋时期的青铜豆,就可以明白此时的簠是如何抢了风头。此时青铜豆的变化在于数量增加,腹部开始变深,为下一阶段的变革作了铺垫。第三个阶段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。春秋早期以后,簠、簠数量减少或消失,青铜豆有了很

【1】 张懋镠:《夷日匜研究——兼论商周青铜器功能的转化问题》,《故宫学术季刊》第25卷第1期,2007年;收入《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》(第三辑),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,第159—161页。

大的发展空间,它的腹部变得很深,虽然也有浅盘豆,但主要流行深腹豆,而且多加盖。我们把这个阶段名之为有盖深腹豆阶段。

先来说第一个阶段。

最早的无盖浅腹豆如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所出假腹豆^[1],平折沿,方唇,浅盘,假腹微鼓,喇叭状高圈足。通高13.4、口径15.0厘米,而豆腹仅有2.2厘米深。这是我们所见最早形态的豆,时间在殷墟二期。同时期的陶豆亦有这种假腹式的,早期青铜豆应是模仿陶豆而来。在殷墟三、四期有一种无盖粗柄豆,腹部稍深些,如举虚豆通高10.0、口径10.7、腹深4.2厘米^[2]。但总体来说,器物比较低矮。在西周早期,铜豆基本承袭商代晚期风格,如史父乙豆通高12.1、口径13.1、腹深4.9厘米^[3],康生豆通高15.1、口径15.5、腹深6.2厘米^[4]。

总而言之,这一阶段的青铜豆虽然也有各种各样的形式,但有一个共同点:腹部较浅。从现已公布的资料来看,这一阶段豆的腹深多在5厘米左右,没有达到7厘米者。

这一阶段的青铜豆既然是一种浅腹豆,其形制特征就决定了它的功能,即仅能盛放酱菜、调味品、干果之类的食品,或者小型的肉食品,如安阳郭家庄东南1号墓出土的铜豆“盘内有鸡(?)骨”^[5],而不能像铜簋那样盛放粟、稷之类的食物。

从墓葬青铜饪食器的组合形式中,我们也可以了解青铜豆的功能。商

[1]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江西省新干县博物馆:《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1991年第10期,第6页。

[2] 程长新、曲得龙、姜东方:《北京拣选一组二十八件商代带铭铜器》,《文物》1982年第9期,第34页。

[3] 卢连成、胡智生:《宝鸡强国墓地》,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,第59—61页。

[4] 张德光:《试谈山西省博物馆拣选的几件珍贵铜器》,《考古》1988年第7期,第616页。

[5]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:《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的发掘》,《考古》1988年第10期,第877页。

代晚期新干大洋洲墓出土鼎31件、甗3件、鬲6件、簋1件、豆1件。^{【1】}安阳郭家庄东南1号墓出土鼎4件、簋1件、豆1件。西周早期宝鸡竹园沟13号墓出土甲组饪食器:鼎7件、甗1件、簋3件、豆1件。^{【2】}可见在第一阶段,在墓葬青铜饪食器的组合形式中,核心器物始终是鼎和簋,青铜豆只是起着辅助作用。

第二个阶段:就器物的空间发展来说,无非是两个方向,一是增高,一是加宽。此时的青铜豆较前一阶段有所不同,有一部分豆有所增高,周生豆通高19.6、口径15.0、腹深4.6厘米^{【3】}。周生豆的高度已经超过某些小型簋的高度,值得注意。另有一部分豆的口径较前一阶段有所加宽,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形态特别的豆——铺,它是豆的一个新分支。铺的特点是盘径极宽大,如陕西长安县张家坡出土的豆通高15.6、口径26.2厘米^{【4】},1976年扶风庄白窖藏出土的微伯癸豆通高13.9、口径27.8、腹深5.6厘米^{【5】},1974年扶风强家村窖藏出土的重环纹豆通高15.2、口径27.0、腹深4.9厘米^{【6】},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2001号墓出土的虢季豆通高15.2、口径23.4、腹深4.2厘米^{【7】}。它们的口径已经超过同时期大部分簋的口径。据陈芳妹先生考证,这类豆的用途是盛放稻粱。^{【8】}看来随着青铜豆形制的变化,其功能也

【1】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江西省新干县博物馆:《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1991年第10期,第4—6页。

【2】 卢连成、胡智生:《宝鸡强国墓地》,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,第49页。

【3】 宝鸡市博物馆、宝鸡县图博馆:《宝鸡县西高泉村春秋秦墓发掘记》,《文物》1980年第9期,第2页。

【4】 郭沫若:《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群铭文汇释》附录,《考古学报》1962年第1期,第12页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:《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》,文物出版社1965年版,第16页。

【5】 陕西周原考古队:《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1978年第3期,第5页。

【6】 曹玮主编:《周原出土青铜器》第2卷,巴蜀书社2005年版,第315页。

【7】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:《三门峡虢国墓》,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,第56—58页。

【8】 陈芳妹:《晋侯对铺——兼论铜铺的出现及其礼制意义》,《故宫学术季刊》第17卷第4期,第78—80页。

在悄悄地变化着。

从墓葬青铜饪食器的组合形式来看,西周中期宝鸡茹家庄1号墓乙室出土鼎8件、甗1件、鬲2件、簋5件、豆4件^{【1】},春秋早期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的2011号墓出土鼎9件、甗1件、鬲8件、簋8件、豆1件^{【2】}。上村岭1052号墓出土鼎7件、甗1件、鬲6件、簋6件、豆1件,1706号墓出土鼎5件、鬲4件、簋4件、豆1件,1820号墓出土鼎3件、甗1件、鬲2件、簋4件、簠2件、豆1件。^{【3】}可见核心器物仍然是鼎和簋。在虢国墓地,无论是九鼎、七鼎、五鼎、三鼎墓,都只出一件豆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茹家庄1号墓乙室里,有4件形制、大小一样的豆,与此时墓葬中簋的组合形式相同,几乎要与簋齐驾并驱。茹家庄1号墓的用豆制度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,或许缘于礼制的差别。但无论如何,都在预示着一场豆替代簋的变革快要到来。

再看第三个阶段。青铜豆形制的显著的变化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。自春秋中期以后,无盖豆少见,盖豆盛行,大部分盖豆是深腹豆。

典型者如1983年河南光山县宝相寺黄国墓地出土黄夫人豆通高29.0、口径24.2、腹深10.8厘米^{【4】},1980年四川新都县马家乡出土盖豆高17.3、口径17.5、腹深8.0厘米^{【5】},1980年河北三河大唐迥1号墓盖豆通高28.0、口径18.0、腹深10.1厘米^{【6】},1975年河北三河双村1号墓盖豆通高33.0、口径18.0、腹深

【1】 卢连成、胡智生:《宝鸡强国墓地》,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,第274页。

【2】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:《三门峡虢国墓》,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,第321—328页。

【3】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:《上村岭虢国墓地》,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,第28、35、39页。

【4】 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、光山县文管会:《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》,《考古》1984年第4期,第316页。

【5】 四川省博物馆、新都县文物管理所:《四川新都战国木槨墓》,《文物》1981年第6期,第5—6页。

【6】 廊坊地区文物管理所、三河县文化馆:《河北三河大唐迥、双村战国墓》,《考古》1987年第4期,第318页。

10.8厘米^{【1】},1987年山东临淄市淄河滩出土的节可忌豆通高22.0、口径17.0、腹深9.3厘米^{【2】},1977年山西长子县牛家坡7号墓出土盖豆通高18.5、口径16.5、腹深10.3厘米^{【3】}。

以上所举青铜豆的例子,其年代从春秋到战国,出土地点从中原到边远地区,由此可见此阶段青铜豆体量增大、腹部变深在全国各地是一种普遍的现象。豆腹的深度一般在8—11厘米。有些豆虽然不算高,通盖高不到20厘米,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腹部较深,没有浅于8厘米者。

这一阶段的青铜豆是一种深腹豆,这一形制特征决定了它的功能,即可以像铜簋那样盛放粟、稷之类的食物。

与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青铜豆相比,此时的豆的器身上多加盖,呈扁球状。盖豆的出现,是青铜豆兴盛的一个标志。因为先前豆腹浅,所以不一定有盖。在出土的东周青铜豆中,有盖豆大致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。由无盖浅腹豆到有盖深腹豆,这一改变提升了豆的功能。(这一点请阅读张翀书稿的第四章。)这种有盖深腹豆的形态与西周时期的有盖簋很接近,也与东周流行的敦相近,所以由它来取代簋,或者在某些地区、某些墓葬中替代敦,正是合乎情理的发展趋势。

青铜豆具备了簋、敦的功能,因此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组合中,逐步取代簋、敦的地位,与鼎、壶形成青铜礼器的基本组合形式。在大型墓葬中,铜豆取代簋的地位,成为唯一的盛食器。例如1977年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地1号墓,墓室面积为102.4平方米,出土饪食器组合有鼎16件、鬲9件、豆7件。^{【4】}这7件豆为盖豆,无耳、高柄,《古代中国青

【1】 廊坊地区文物管理所、三河县文化馆:《河北三河大唐迥、双村战国墓》,《考古》1987年第4期,第321页。

【2】 张龙海:《山东临淄出土一件有铭铜豆》,《考古》1990年第11期,第1045页。

【3】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:《山西长子县东周墓》,《考古学报》1984年第4期,第509页。

【4】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沂水县文物管理站:《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1984年第9期,第1—4页。